



美学：走向跨文化的对话与整合

作者：詹七一 信息来源：投稿

[摘要] 在主客体二元对立转化为主体间对话的哲学文化背景中，当代美学研究面临着中西方通过对话走向整合的趋势。本文认为，在美学对话的重建与可能性基础上，通过中西美学异质性与互补性的比较，有助于发现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前景并克服近代以来西方美学的独断与形而上学，从而在跨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美学。

[关键词] 中国美学；西方美学；跨文化；对话；整合

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为开端，70、80年代之际的“美学热”为标志，当代中国美学史走过了一段曾经辉煌的历程；《美的历程》等多部中国美学史著作和近百部西方美学译著的出版，无疑是中西方美学辉映的结晶。然而，“中国美学”与“美学在中国”的区分、争鸣与辨析至今仍在继续，依旧未见分晓。加之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现代主义建构与后现代消解、解构意义的介入、大众文化的潮起浪涌以及精神生态失衡引发的伦理、信念危机，科技发展同时触及的人文精神危机，一系列新的牵涉审美及精神文化的问题层出不穷。进入美学视域，亟需作出清醒的思考。

1. 美学对话的重建与可能性

笔者曾在拙文《美学：从意识形态独白走向对话》⁽¹⁾中认为，从社会功能上看，新时期的美学曾一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承载着为新的人性理想提供范例的历史使命。那时，在干预生活的文学和关注现实发展远景的哲学之间，美学趋于远离现实的极端，借助于对完美人性的憧憬保持着浪漫玄想的身份，含蓄地表达了跨越实用、理智的逻辑思维并远避物质社会的意向，具有人文知识分子追求自律的独立地位的隐晦含义。同一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以社会现实为一端，以超越现实的人性理想为一端，以文学创作和美学建构为标志，刚好达到了某种平衡。80年代中期以后，人文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倾向日趋突出，在西学思潮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之间，日益政治化和激进化，于是，这种平衡便被打破，美学渐渐为知识界和公众所冷落而退回专业学科领域。在本质上，美学已逐渐演化为一种“独白”的封闭体系而归于沉寂。

90年代以来，商品浪潮的兴起及市场文化语境的展开，预示着蜕去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学必须直面当代审美观念的种种转向，并内在地吁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智慧去从事美学思考。美学之为美学，并非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独断的封闭体系，而是一种较理论体系更为合理而根本的理论智慧。在审美观念的当代转型事实中，由于不仅发现了自身的有限性，而且发现了自身有限性的永恒性，当代美学义无反顾地从“独白”转向了“对话”。这一趋向，可以从许多当代西方美学家和部分中国学者的著述中看到。⁽²⁾不难发现，20世纪以来的美学主要从文化批判、非理性考察和语言维度切入研究对象。其中，语言的本性固然在于说，但说的前提是因为有听的存在，于是，又从语言转向话语，尤其是对特定的交流情境即语境给予观注，从非理性转向新的理性，从文化批判转向文化整合。它们都把焦点对准一个方向：对话。所谓“对话”，就是美学家认为自己不可能完全从逻辑上把握、规定和制约对象，它以承认美学的有限性即非独断性为前提，强调美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以及自我的非中心化。任何美学理论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方的自觉交流与另一方的主动参与是其内在的要求。对话意味着强调人类生存及文化世界的任何一方都包含着价值与功能上的有限性，并要求在它们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以崭新的、

不确定的、多元的世界取代传统的、确定的、一元的世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当代美学，也应该是蕴含在这“必要的张力”之中。

在当代，传统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已转变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这就是所谓“文本间性”，其哲学的根基就是“主体间性”，即主体间的对话。在这里，一切创造都不再是绝对真理的发现，而是文化文本间的某种对话的结果，对话的双方只有特点之分而没有高下之别；只有双方之间的相互启发而没有你死我活。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习惯于把世界划分为一主一仆，不是为主就是为仆。就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区分与关系而言，不是把中国传统美学作为本位绝对化，从而拒斥西方美学，就是把本质上作为区域理论的西方美学权威化。必须指出的是，对话强调的不是主、仆之间的换位，如过去以传统美学为主，现在就以现代或后现代美学为主（尤其是干脆以西方美学为主），而是对话的双方从各自有限的世界中走出来，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相遇、碰撞，结果亦如中国文化早就发现的：从“阴中有阳”到“阳中有阴”，再到“阴阳互生”；从“刚中有柔”到“柔中有刚”，再到“刚柔相济”。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不论是作为社会系统、文化模式的交流还是群体的互动，都是以符号为媒介的，有符号就意味着不可能是单向的交流，它指向双向的对话——既阐释对方同时也为对方所阐释，从而在融合中产生新的性质和功能。事实上，人文科学的问题，尤其是美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解释学问题，无法用“是”与“非”来回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话导致了一场人文科学自身的革命；一种在对话中生成的，位于对话双方之间边缘地带的当代美学，正应该在这样一种人文科学自身的革命中应运而生。

2. 跨文化的中西美学对话

跨文化视域中的中西美学研究，预示着一一条新的旨在追求美学进一步发展、创新与超越的途径。这里的所谓跨文化视域，在很大程度上不局限于单纯的美学理论向度，而是一种跨越文化的比较研究。以此为阐释的出发点，有可能引导出一种跨文化的美学（trans-cultural aesthetics）研究。跨文化美学中的“trans-”，有“跨越”、“超越”等内在目的性的含义，因此，尤其需要一种在跨文化形态中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对话的意识，不仅在西方与东方之间，也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进行，所谓“会通中外，融贯古今”，可谓道出了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实质。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可靠而翔实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出发，对相关的理论及概念形态进行客观、平等的比较与分析，进而探讨会通与整合的可能途径，以追求美学理论创新性的超越或超越性的创新。在此过程中，既可在时空背景上依据历史文化发展相对平行的原则，开展作者、文本、学说之间的比较与分析；也可以打破时空背景和历时性的界限，从善与美、虚与实、阴柔与优美、阳刚与崇高、韵味与意义、神思与想象、道德与自由、体悟与经验、临摹与模仿、写意与抽象等美学范畴的层面，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可能和整合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此种研究要本着相对主义的态度，设法戒除以本土文化的视界去评判异质文化问题的话语强制，又要尽力把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及其演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融合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给予立体性的分析与梳理。从中所得到的启发和感悟不仅来自美学理论的学理层面，而且来自不同美学理论所据以形成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差异。特别是其中的差异，更富有文化和认知意义上的新奇性和启发性，尤其能激活思想、促发灵感，氤氲出创新与超越的可能。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合理性与其超越性正是以其互补性为基本条件的。

在美学的学理内涵和方法论的意义上，中国传统美学更多地来自艺术创作与欣赏经验的归纳与总结，注重内在生命的自由和直觉妙悟式的体验，因此，高度重视艺术家的内在心态与精神过程，高度看重其内省或自省的工夫，同时也高度重视艺术创作及文本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关系。相关的经验总结或理性概括也大多强调艺术家如何提高自身的“才、胆、识、力”，以期修炼成有利于审美创作的超越心态即进入艺术境界。同时还建议欣赏者如何气静神闲地进行艺术鉴赏，以摆脱现实的羁绊与冲突，进入内心的自由与和谐境界。西方美学自古希腊以来便具有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以本质或本体研究为其基本样态（forma），往后在科学精神和思辨传统的推动下，建构出系统化和多样化的理论学说。在当代，西方美学仍然延续着古典时代以来的哲学蕴涵，只不过在哲学研究转向后，随其基本样态的变更而有所不同，更倾向于从语言维度、社会文化批判

的视角切入美学研究,同样追求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内在一致性。西方美学也论及艺术,但更多地是从形上学或本体论出发,去探求艺术本体的理念及其本质特征,并把艺术、艺术价值与其表现形式归纳为确定的形态并划分为不同的流派(如写实、浪漫、再现、表现、具象、抽象、行为、观念等)。

比较而言,西方美学注重科学分析及其逻辑的严密性,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其概念界定明确,门类划分清晰。中国美学则注重艺术创作与鉴赏经验的总结,多出自于艺术家和鉴赏者即兴、片断的感悟,并用简略、含蓄而不脱具象的语言进行表述,其话语逻辑的连贯性和明晰性相对欠缺。但西方美学过分依赖从对美的思辨哲学假定中进行演绎推理(古典时期),或进行高度专业化的语言、文本内结构分析等(现当代时期),致使许多美学家认为,美学的根本问题勿需涉及西方以外的世界艺术乃至任何艺术便可得到解决。其结果是不大重视不同民族与不同历史时期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及其价值。西方美学在世界范围内文化上的话语霸权和学术上独断的形而上学,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美学由于较多强调个人创造的审美心态和艺术实践,鼓励个体的审美自由和深度的审美自省,因此稍显个人化而不易把握;虽然注重审美功能中的伦理精神与生命意义,认为艺术在观者内心中激发的共鸣以及主观而独特的审美经验值得他人借鉴,并当作范例加以推广,但表述的具象化与非概念化又使其欠缺普泛的、可操作的理论意义。

从跨文化美学的意义上看,美学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命题,应该建基于对所有重要艺术与审美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之上,加强对中西美学互补性的研究,可以认为是美学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创新性超越或超越性创新的理论基础。当然,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发现,在理论旨趣及其文化内涵等方面,中西方美学有某些相通之处。除了学界已知的一些观点外,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美国学者大卫·布鲁贝克在阐述梅洛-庞蒂与东亚美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老子哲学与梅氏思想有相通之处(如感知的可见性、虚空、视而不见之物、内观自省等)。中国学者朱立元认为,当代西方的一些哲学家表现出了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思想,这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具有共同之处,反映在艺术哲学或美学领域也是如此。香港的文洁华博士着重探讨了儒家思想中有关人体表现的论述,指出在西方学术界和艺术界,近年也出现了要求重释人体,重新规定其地位和性质的呼声,人体理论和人体艺术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学者杰克·斯佩克特则用详尽而有说服力的例证和图片资料,形象地描述和展示了中国书法对20世纪早期的法国与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和绘画的影响,等等。(3)

应该说,早在上世纪初已有国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思考,如王国维的“美育说”、“解脱说”、“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和“境界说”等美学“六说”,尽管借用了西方美学的某些理论,譬如康德、席勒、叔本华和尼采的相关论点,尤其是“境界说”不仅受席勒“审美王国说”的影响,还受到康德“精神说”的启发。但王国维的学说根本上还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之中,其理论的生发过程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创造性的转换过程。时至今日,这一范例依然值得我们在发掘传统美学资源和研究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并继续进行创造性转换时加以借鉴。笔者认为,王国维的美学理论暗含着一种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视角,实质上涉及了社会个体的审美维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其认识维度与社会实践维度,以及对其精神人格的形成有何意义的问题。而这种社会个体生成论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所包涵着的一种指向性的人文精神,只不过比较强调其中的伦理性的人格意义。以这种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为基础,就有可能扬弃传统认识论所固持的主客二分对立的预设模式,从而超越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

可以看到,中西方美学虽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创生,但某种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启发关系还是客观存在的,尽管这并不能构成一种一般与特殊或其他形态的主仆关系。但是,寻求中西方美学的互补或融通,并不等于一种观点具有普遍的可适用性。在上述会议上,德国学者卜松山即以“译不可译之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之路”为题指出,面对一个具有根本差异的文化,我们意识到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符号学体系,这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加以翻译或解释,并且可以通过该文化的文学艺术来了解这个迥异的文化。但在论及中国诗歌的翻译问题

时，又重点指除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与不可译性的互动关系。(4)通过对中西方传统审美文化价值观的考察可以发现，二者基本上是一种异质文化。其异质性表现在西方以美即真，美即科学、美即写实表现，以及以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作为其审美价值观的核心观念。中国则以美即善，美即精神个性、美即虚拟性表现，以及以泛自然主义审美理念等作为审美价值观的核心观念。这使得中西方审美文化的交流，基本上是各行其道，所取所予不尽相同，始终难以达成双方整体上的共鸣、默契与认同。所以，应当把中西美学的“对话”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与外来美学资源的发掘、汲取以及对它们的特征的把握，要求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始终保持一种“现实的历史态度”，即能够以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来理解历史与外来资源的“现实合法性”，在中国美学的历史传承结构上发掘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前景”，以及在西方美学的理论系统中发现外来学术资源的“本土适应性”；换言之，对于本土与外来学术资源的清理和研究，始终要同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目标联系在一起。

3. 跨文化整合：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和对外文化交往的增加，中国学术界也愈来愈具有强烈的参与国际间对话的意识，使得西方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进入中国学人的理论视野，以至当代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潮几乎可以同步地在中国得到反响。然而，在这些对话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当代中国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学，以至有中国学者急呼，当今中国文化正面临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处于“失语”的窘境之中。

在学术本位上，我们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之“根”，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到与世界的思想对话和交流之中。从本土文化的视界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来看，现行的整个美学学科体系是西方人建立的，但是，立足本位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固守这种传统而不能汲取西方的思想及其言说方式。问题在于，对话必须要有可资对话的基础，我们只有在有自己的东西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否则，只能做西方理论的应声虫。这就必须让历史文化传统中那些仍然有生命力的思想切实地进入当代美学思想的建构之中。

全世界的美学家们都在复述这样一个事实：18世纪中叶，德国人亚力山大·鲍姆嘉腾提出并建立了美学这一人文学科，往后从18世纪末的康德到19世纪的许多德、英、法等国的学者们，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非西方的学者只是学习、翻译和阐释者，他们将西方的美学名著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国的材料进行解说。在这种态势中，西方出理论，非西方出材料。在中国学人的心目中，这种意识也曾根深蒂固；从翻译西方美学著作到选取中国材料来解释西方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主流趋势。后来虽有一些改变，但直致80年代仍是主流。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的深入，中国传统美学也逐渐受到了高度重视。但从学理层面看，近年来对传统美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发掘和整理，越来越多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的问世而较少当代共时性意义的专项研究，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现状。因此，要真正使中国传统美学成为可以与西方美学构成学术上平等对话的现代性的活的思想，尚需时日。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承认历史上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美学的独特价值，而在于认真分析、总结其中的独特价值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些独特的思想是如何与当代世界的文化和美学建构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的意义上，问题就必然转化为，我们能从中国传统美学中发掘和继承一些什么具有现代性前景的思想，以及怎样继承。承认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不难，但如何使这种“意义”进入当代的美学理论建构和审美实践之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中西美学对话关系确立基础上企求整合的未来趋向，中国传统美学如何创造性地作出调整与适应，并在保持自身独特话语的基础上寻求与西方美学的会通与整合，是当代美学工作者亟待研究的课题。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蕴涵及其对当代美学建构的意义，大致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首先，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超越从纯粹认识论的角度去演绎美学理论的形而上学方法。中西美学从对话走向整合，对中国美学当代建构的启示，在根本上就是方法论意识的启示。学术研究的方法是一个内在的规范系统，方法的展开就会形成一定的逻辑构架，同时也会构建起相应的

观念体系。因为方法与观念、逻辑构架与理论体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学科的理论创新往往是从方法的创新开始的，中西对话所实践的比较研究，内在地要求一种辩证综合思维的方法论；比较研究在中西方美学资源中的展开，离不开内在的辩证综合理论建构方式的运思，否则只能停留在原始朴素辩证法或近代形而上学层次上，而仍然局限性中西同异之辨、优劣等分的怪圈之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一种把哲学命意、美学向度、人生感悟以及人格建构汇为一体的综合圆融的方法论，它有助于建构一种不脱离人的感性生活实践过程的美学，从而在自然、社会、人生的总体把握和感悟中去理解、阐释审美和艺术的本性，并实现其价值。

其次，在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并对自然采取审美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中心化乃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表现在文化中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二百多年来随着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完成，呈现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强烈的人类霸权倾向；在意识形态及其审美领域亦复如此。当今，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日益恶化，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意识中，自然对于人来说不是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也不是一种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而是有灵有性的可以与之交流和欣赏的对象；是可以抚慰人心疲惫、疗救精神创伤的一个温暖的家园。当代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也认为，近200年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自然界的其他生灵与物种只是人类的陪衬而已。与此相反，亚洲的艺术则常常表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势，隐含一种由所有生物组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种东方式的独特意识，会启发人们产生新的智慧，打造一种能够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5)因此，如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从被动的、害怕受自然规律惩罚抑或大肆掠夺的角度去对待自然，把单向度的人化自然转变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亲近与依赖，从而真正把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根”和人类的“大地之母”来对待，亟待当代美学深入研究。

再次，在追求审美化生存理想的意义上，变形而上的追求为当下的现实超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化生存不仅是道家哲学与美学所追求的理想，也是孔子的儒家哲学与美学所内蕴着的一种人生态度。如果说儒道之间有诸多对立与互补，而在这一点上，它们之间却有更多的一致之处。与西方相较，中国文化中宗教传统的缺乏和现代宗教意识的衰落，更使得这种审美化的生存理想成为国人疗救心灵衰颓的有效途径。在儒道哲学与美学中，也内蕴着追求形上超越的精神意向，但明确指出形上超越不是在彼岸世界，而是就在此在的生活世界中，在人对自然的亲近和归依的过程中，在人的艺术创作和欣赏过程之中；超越不是向天国的超越，而是此岸的生活世界的审美和艺术超越。这种观念，亦有助于跨越西方传统的在上帝的天国即彼岸世界里寻求超越的形而上学。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也指出，当代实用主义美学的基本特点在于通过“生活艺术”和“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等概念，坚持艺术对改善人类生活的所起的积极作用。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强健人的体魄，提高整个群体的生活质量。因此，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美学与美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这与中国儒家的诗教与乐教观念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最后，在审美及艺术的发生论和本体的意义上，舍先验理念或先在实体而为自然与人文意义上的天人感应观。西方传统的建构在哲学体系下的美学理论，倾向于把审美或艺术放在本体论的实体或心灵的意义上去看待，不论是探讨其起源还是文本的创作和批评，都要把所建构的抽象理念或确立的先在实体放在第一位，从而认为审美活动或艺术创造的本质是客观真实事物的反映，或主观情感自我表现，乃至某种非理性的生命冲动的自我表达方式。而中国传统美学并不把艺术看作是某种客观现实的忠实反映，也不是艺术创作者心中某种非理性的生命冲动的表现，更不是一己狭隘情感自我表达，而看作是人与自然之气交会感应之后的一种生命创造。这种审美或艺术的本体观把审美的艺术创作深深地植根于宇宙与自然的生机运行和生命流动之中，因而具有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源泉。已有西方学者明确指出，东方美学是当代艺术教育理论的渊源，认为与西方教育传统相比，亚洲传统的艺术哲学处在一个主张天人合一的环境之中，中国的艺术哲学尤为如此。作为后现代化时代的必修课之一，扩展性综合艺术教育模式（MECAE）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对美与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来源与演变有一个较好的认识，而东方哲学和美学具有整体性和与自然协调一致的特点，因此基本上可以用来发展当代课程和艺术教育理论。(7)

以上几方面只是极粗略的归纳与解说，错漏在所难免。但不论怎样，中西方美学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在它们之间通过对话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对话”即是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历史相互沟通的存在方式，从而具有人类学本体论的意义。它不仅消解并超越了抽象普遍性对人的统治，使普遍——特殊关系结构向整体——部分关系结构转变，而且还消解并扬弃了文化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使人的存在获得了开放性和独创性，因为对话者参与了意义的生成。同时，它还使得不同文化视野的整合成为可能。对话者的独特视界，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平等性和互斥性，他们有可能通过互斥所形成的张力来遏制各自的自我中心化扩张，打破抽象普遍性的独断与支配。对话双方的平等与互斥恰恰蕴含着整合的要求；对话双方彼此都同时拥有发言权，才有可能把各自的视野整合起来。双方视野的独立与局限则使整合成为必要。视野的独立还意味着一方不能被还原或归结为另一方，这种不可替代的关系决定着不同视野的互补性；对话过程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尺度的相互矫正与耦合，其结果是消解自我中心化结构及其所伴随的独断化，并在此基础上使不同的文化视野在互补、互参中意识到各自的有限性与对方的合理性，从而容忍对方的存在并逐步融为有机整体。总之，对话关系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及其文化的一种更加健全的存在方式的崛起。在中国美学当代建构的意义上，对中西美学对话关系确立基础上企求整合的研究，亦可作如是观。

参考文献：

- (1)(2)参阅詹七一《美学：从意识形态独白走向对话》[J]，《西北师大学报》，2002(6):13-17
(3)(4)(5)(6)(7)见杨富斌《建构世界美学的一个转折点——“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J]，《哲学动态》，2003(1):23-25

Aesthetics: Marching into Trans-cultur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ZHAN Qi-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 Kunming College , Kunming Yunnan, 650118)

[Abstract]In the background of change from antagonistic relation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to dialogue between two subjects, modern aesthetic research is faced with the tendency that China and the West seek for cooperation through dialogu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 and genera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basis of feasibility to rebuild aesthetic dialogue can benefit to discover the modern prosp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to eliminate the arbitrary and metaphysics of the Western aesthetic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so as to establish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through trans-cultural cooperation.

[Key words]Chinese aesthetics; Western aesthetics; trans-culture; dialogue; cooperation

作者简介：詹七一，男，1960年7月出生，昆明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转载请刊出本网站名

相关文章

- ❖ “经”的读法
- ❖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诠释
- ❖ 心灵的解构与重构
- ❖ 论分工与分配的经济学哲学内涵
- ❖ 回忆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 ❖ 《洞天玄记》的隐喻系统与杨慎“游神物外”之宗教意识
- ❖ “道德”人性的终结与法制思想的产生
- ❖ 黑格尔《历史哲学》读后随笔

您是第282330位访客：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版权所有 2003：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技术支持：千年科技